

苏南冲突经历

1948—1953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

苏南冲突经历

1948—1953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

达 洲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ZGUBLJENA BITKA

J. V. STALJINA

SARAJEVO. 1969

根据萨拉热窝“光明”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略有删节。

苏 南 冲 突 经 历

1948—1953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

达 洲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281,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91 定价 1.45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是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论家。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任南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中央国际联络部负责人、政府新闻局局长、政府发言人、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四年因支持吉拉斯被撤职，先后在美、英、北欧一些大学任教。曾应英哲学家罗素邀请，与法国让·保罗·萨特等欧美著名人士组成“越南战争罪行国际审判法庭”。一九六七年起为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著有《铁托传》（有中译本）、《巴黎会议》、《美国纪行》、《南阿关系》等书。

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九年，作者在前言中说，促使他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是苏联一九六八年八月伙同华沙条约其他四国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使南斯拉夫受到威胁。作者在扉页上还表示，这本书是献给苏侵捷时在布拉格当众自焚身死以示抗议的捷爱国青年学生扬·帕拉赫的。

这本书对一九四八年苏南冲突的由来和经过，提供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材料和看法，同时也涉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事件，如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活动、阿尔巴

尼亚的科奇·佐治案件、捷克的斯兰斯基案件、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案件等。作者在南历任要职，与铁托关系密切，书中透露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可以作为了解和分析上述历史事件及南共观点的参考资料。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暴风雨之前	2
遥远的印度之行	22
死神与加尔各答城	26
革命的本能	31
去中国无路可走	35
恶梦是事实	40
第二章 分裂的由来	45
斯大林的两副面孔	50
同斯大林的最初的一些误会	66
斯大林由于南人解委员会的决议而大发雷霆	72
划分利益范围的最初消息	77
伦道夫·丘吉尔泄露天机	81
温斯顿·丘吉尔证实一半对一半的协议	89
雅尔塔、南斯拉夫和中国	95
第三章 冲突的核心：经济关系	103
争夺南斯拉夫的原料	119
第二个合营公司	124
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垄断	128
了解真相令人痛心	132

斯大林和我国革命	137
经济封锁开始实行	142
第四章 冲突公开化	148
冲突国际化	166
日丹诺夫：争执很快就会消除	171
铁托为什么没有去布加勒斯特	176
1948年6月28日：公开革出教门	183
在布拉格的全民投票	188
谁都不相信我们会得救	193
回到游击队的道德风尚	198
短暂的假停战	216
安娜·波克指使阿尔索·约万诺维奇	221
足球上的俄国处方	226
维辛斯基和一杯辣椒酒	231
第五章 孤立无援	237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谈1948年	253
中国共产党人和情报局决议	258
真正的革命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264
对季米特洛夫的名字表示敬意	269
一个范例	275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书?	280
与铁托同志一起共度1949年新年	286
莫斯科出卖科罗什卡的斯洛文尼亚人来 换取美元	305
苏联的最后通牒和普西奇·祖巴托维奇	311

第六章	东欧的宗教裁判	318
	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忏悔	324
	科斯托夫、克莱门蒂斯和安德烈·西蒙	330
	政治谋杀之谜	337
	路易·亚当米奇之死的秘密	343
第七章	突破包围	366
	南斯拉夫被选进安理会	373
	我的大学	378
	奥普莱纳茨的恶梦	385
	一个有教益的故事	391
	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	398
	南斯拉夫向联合国提出控告	405
第八章	良心的自我反省	424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合作社垮台	430
	建立人道关系的艰难道路	437
	斯大林、毛泽东和我们的足球运动员	444
	铁托传问世	449
	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457
	斯大林之死	465
附录	1948—1953	481

前 言

这本书谈的不是 1948—1953 年间所发生的事件的经过,而是我本人在这些事件中的经历。

这本书是首先在卢布尔雅那的《劳动报》,随后在《新马其顿报》,萨拉热窝的《解放报》以及最后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快报》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的汇编。

• 这些文章有三个主要来源:

我为我写的《当代南斯拉夫史》一书所搜集的文献,

我在 1948—1953 年间的日记,

我对这一时期的回忆。

促使我着手写这些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另外四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侵略。

我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来写这些文章,把别的工作全都放下了。驱使我这么做的是,如同二十年前一样再次危及南斯拉夫的威胁。我相信,年轻一代在这些文章中可以找到材料,使他们得以对苏联和南斯拉夫 1948—1953 年间的冲突的实质得出自己的结论。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

1969 年 1 月 16 日于博希尼

第一章

暴风雨之前

1948年1月，我本当到中国去，设法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作此行的想法，是铁托同志提出的。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到他那里去，把我写的关于巴黎和会的书的第一份送给他。他沉思着，想着什么。他说：

“你难道不能写一本这样的书，谈谈中国革命，我们这里关于中国革命写得不多。”

这个建议使我感到意外。我开始喃喃地说，那样，我就得撂下一切工作。当时，我担任新建立的总理府新闻局局长的职务。此外，我又是南共中央鼓动宣传部新闻鼓动处领导人，南斯拉夫出席联合国大会年会的正式代表以及南斯拉夫派驻(联合国)处理人道主义、社会和科学问题的第三委员会的正式代表。我还常在高级党校讲授国际关系，我还是南斯拉夫体育协会的主席，还在编辑《三十天》这份月刊……

“你要是愿意，这一切你全都可以撂下……中国是最重要的……你又喜欢写作……只是，我担心你的身体。去年你在莫斯科陪卡德尔时，头上的伤不是又使你犯了癫痫吗……我担心你的身体经不住长途跋涉，你又得处

在游击战的环境下……而且你还有个家……”

我暗自感到羞愧……我想干我的老行当——从事写作，我又想担任党和国家的职务，两者总是使我感到难于分身……诚然，战争结束以来，我在三年内发表了四本书，我一直在记日记，这是有某种野心，还是对我们中间那些最优秀的同志的责任感？他们牺牲了，我就有义务尽我所知、尽我所能，把现在的斗争写下来……过去，我也考虑过这一点……对于我所担任的工作，我也是出于责任感担负起来的。但是，难道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吗？随职务而来的一切，出头露面啦，别人对我的奉承、赞扬啦，能够对别人的命运作出决定啦，这一切难道不吸引我吗？……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铁托同志本人帮了我很大的忙，为我开创了可能性，使我得以从事我最有心于从事的活动，也就是说，从事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最亲近的，因为通过写作，我又一次——我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经历在游击队的那些日子……

我回想起 1941 年，第一次攻势之后，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来当好政委的角色，铁托同志就建议我记日记。现在，他又给我提出了好建议——让我写一部关于一场伟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的书。

但是，我没有马上就找到话来表达我的这番认识。我试图用笨拙的说笑来避开它。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笑话是针对别人的（因此，我得了“瓷器店大象俱乐部主任”的外号），但是，这一次我弄巧成拙了：

“我的身体，你不用担心……不错，我是百分之九十的残废军人，正因为如此，我只能以百分之十的能量来干蠢事，要是我完全健康的话，我就会以百分之百的能量来干蠢事了……”

后来，我振作起精神，接受了到中国去的建议。当我出来时，在寒冷的夜晚，我自问道，一个人怎么有时候变得耳不聪目不明……作一次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旅行，去迎接这样的事件，难道不比呆在新闻局里制订工作条例，规定官员应当关紧抽屉……等等更为美好吗？

大清早，我就到外交部找东欧司司长伊沃·韦伊沃达^①，请他办理途经苏联的过境签证，以便我进入中国北方，毛泽东的总部设在那里。

尔后，我就整理了我自己有关中国的材料，并要人提供新的材料。战争爆发前夕，我曾在贝尔格莱德半合法地出过一本有关中国，有关中国游击队的书。在这件事上，米洛万·亚克希奇帮了我的忙，他是参加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世界足球锦标赛最杰出的守门员，按职业来说，是开书店的。总的来说，在运动员中间曾有许多同我一起工作过的进步人士。在国家足球队有名的后卫米卢廷·伊夫科维奇博士，右锋，也是国家代表队队员

^① 伊万·韦伊沃达（1911— ），曾参加西班牙内战，1941年参加南人民解放斗争，1944年任南通社社长，战后任副外长，驻巴西、捷、英、法等国外使。伊沃为伊万之昵称。——译者

亚历山大·蒂尔纳尼奇以及我少年时代的同学，巴尔干田径赛冠军德拉戈什·斯特万诺维奇的帮助下，我们成功地抵制了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米洛万·亚克希奇同意由他的书店以白熊丛书为名出一套书。这样，我们就出了谈斯达汉诺夫的书，出了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的俄国记游以及马辛上校谈红军的书。关于中国的书，我采用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共产国际地下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的成员的文章，编成一本完整的书。我特别注意在书中吸取中国游击队员的经验。

这本书遭到查禁，但是在亚克希奇和党的通讯机关的帮助下，这本书在南斯拉夫全国散发了三千多本。战时，我在波斯尼亚的一个游击队里找到了一本，当时，我感到很高兴。书中记载了游击队的神圣格言：“人民是水，游击队员是鱼”；这一条对所有的解放运动都是适用的，不论它们彼此相距有多远。

我和斯雷滕·茹约维奇^①是战后最先会见中国游击队员的两个南斯拉夫游击队员。那是在1945年4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旅馆里。联合国组织成立大会当时正

^① 斯雷滕·茹约维奇(1899—)，1922年加入南共，至1937年任历届南共中央委员，1941年参加南人民解放斗争，为塞尔维亚地区游击队司令，南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成员，战后任财长，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因赞成情报局决议，被解职。后任南经济研究所所长，《战斗报》新闻出版社经理。——译者

在这个太平洋滨海城市里举行。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是伊万·舒巴希奇^①，斯雷滕·茹约维奇和我是代表。

蒋介石的代表团也在旧金山，代表团里有一个共产党人——中共政治局委员董必武。

当时，盟国三强认为，它们通过彼此间的协议可以来解决革命蓬勃展开的一些国家的内部关系，因此发生了上面列举的那样的荒唐情况。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也没有想到在蒋介石的代表团里会有共产党人这样的事！

我第一次遇见董必武是在苏联外长、苏联代表团团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眼不离莫洛托夫，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他。莫洛托夫走到茹约维奇和我的身边（茨尔尼^②穿着将军制服，我穿的是上校制服），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年长的、很有风度的中国人。在场的还有几个波兰人以及捷克人，莫洛托夫开始向周围的人叙述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是如何同德国人斗争的。乌克兰外长，共产国际原来的书记季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更为热情焕发地继续谈论这一话题。他是一位动作十分活跃的人，头发已完全斑白。他用他那不大的

① 伊万·舒巴希奇（1892—1955），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人，曾任南王国伦敦流亡政府副首相，1944年与铁托合组南人民解放民族委员会，任副主席，1945年在联合政府中任外长。后辞职。——译者

② 茨尔尼指斯雷滕·茹约维奇。——译者

拳头敲着我的胸脯，对一个波兰人说：

“这位上校，当德国人在德尔瓦尔空降想俘获铁托时，挺身而出，救了统帅的命，而自己挨了三颗子弹……”

我紧握双手求告：

“不是这么回事……”

马努伊尔斯基再次轻敲我的胸脯：

“你看看，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多么谦虚……他们对自己的功勋只字不说……”

随后，他向我眨眨眼，把我往一旁拉了拉，悄声说：

“我是故意在波兰人和捷克人面前这么说的，让他们看看，情况最危急时应当怎样战斗……”

马努伊尔斯基没有想到，这番想出来的故事恰好打中了我的痛处——使我想起我的一些最好的同志牺牲了，而我却受到了惩罚，在他们死后还要活着。

那位年长的中国人看着、听着这一切，临走前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用英文印着：

“董必武

中国出席联合国关于国际组织会议代表。”

他说，他想见见茹约维奇将军和我：我们握手时，他要我把名片还给他，他拿出铅笔来，在上面写上了他在费尔蒙特旅馆里的房间号码——1480。

当晚，我又去见电影导演、记者奥森·韦尔斯。他还在1942年时就开始维护游击队员，揭露德拉扎·米哈伊

洛维奇^①。我们是在旧金山认识的，那天晚上，我要给一批美国记者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也想参加。

听了马努伊尔斯基那番话之后，我情绪很不振作。而记者们的情绪就好象是胜利者似的，他们向我提出了有关德国人的许多问题，他们不把德国人叫德国人，而是叫做弗里茨和蛮子。有一个生在加利福尼亚的约克军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在德军撤退时曾俘虏过一百二十四个德国人。问题都是本着下面这样的精神提出的：

“上校，您是否打死过成百名德国人？”

我挖苦地回答说：“嗨，要是每一个游击队员打死一百个德国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因为再也没有德国人了！”

“您是否打死了五十个？”

我沉默不答，过了一会儿，第三个又问道：

“那么，您是否至少打死过十个德国人？”

我振作起精神来，并开始解释，我参加过几次战斗，但是我不知道，我打死了多少个德国人。记者们不满意，有一个记者刺耳地说：

“您的传记说，您曾三次受伤……”

这时，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①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1893—1946），二次大战时，任南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并为反动民团组织切特尼克的头子，1941年投靠德意法西斯占领当局，与南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1946年7月16日被判处死刑。——译者

“是的，我曾三次受伤，但是这三次，全是在我从战场上逃跑的时候，子弹打中我的，因为游击队员的能耐就在于决不充当敌人的靶子。”

奥森·韦尔斯开始大笑，在这批幼稚愚钝之辈中间唯有他明白，我想讲的是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天，茹约维奇通知我，苏联代表团秘书诺维科夫来过，传来了口信，说莫洛托夫邀请我们到加利福尼亚一游。

我们乘小汽车前往帕洛阿尔托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就设在那里。我们在郊外的一个小地方进了午餐。到饭馆吃饭的人认出了莫洛托夫，开始向他鼓掌。一位年纪较大的人叫了起来：

“瞧那个俄国人，靴子上还有雪……”

饭馆女老板最后走到莫洛托夫身边，拥抱了他，并说，她有个儿子在太平洋服役，她相信，盟国不久就会胜利，她的儿子也就会回到她的身旁。

我们大家都为这些场面所感动。傍晚，茹约维奇和我同中国人董必武呆在一起。他年纪比较大，有六十多岁，举止很有风度。他先向我们叙述了自己的生平。他的俄语讲得很好。他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他参加了1921年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以前，曾当过国民党的领导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隐瞒自己的社会出身：